

世紀回顧筆叢

主編：賈植芳 藍 軍

未 燒 書



時代文藝出版社

世紀回顧筆叢

主編：賈植芳 藍 軍

未 燒 書

時代文艺出版社

总 序

贾植芳

二十世纪浩浩荡荡，眼见就要给它打上句号了。过来人无一例外，都将因其不平凡而引以为荣。

简而言之，二十世纪的不平凡处在于地球越来越小，人类的世界观越来越大，稍微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超越了过去任何世纪难以突破的地区意义。说具体一点，本世纪经住了考验人类命运的两次大战，从而促成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溃败；随着空前壮观的科技进步（包括核能发现和空间拓广），还对人的复杂性和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不论在大社会还是在小社会，打破了各种各样的铁板一块和舆论一律，出现了许多特立独行者所构成的多元化局面。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终于胜利完成百年来浴血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而开始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醒觉，走上了为像现代人一样生活而进行的改革开放过程，特别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一直在庄严地深化着以鲁迅为旗帜的改造国民性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有令人困惑乃至令人沮丧的种种，世界原是复杂的。

本书系的几位作者，大都出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以上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都承受过随胜利以俱来的挫折、失败、灾难和痛苦。他们可能有幸和年青一代一同跨入新世

纪，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失败和胜利毕竟不得不和二十世纪荣辱与共。他们通过各自狭小的“命运之门”，居然体验到人造权威的短暂，干枯教条的脆弱，不义者自毙的必然性，辩证法的无情和有情，终于有觉悟将坚忍中的乐观精神提升为原则。目前正处于世纪末，历代过来人都有检点足迹、向自己所属世纪告别的习惯，这几个作者未能免俗，也想借此整理一下自己作为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经验、思考和认识，这就是本书系的缘起。

创造和改变历史，是叱咤风云的雄才大略者的志愿。记录和总结历史，非博古通今的大手笔莫属。这几位作者不会狂妄到以这二者自居，他们不过自信忠实于自己的记忆，因此他们的强处不过是一份真实和一片诚恳。凭借这点强处，他们既不躲闪，也不隐瞒，求仁得仁，无所怨怼，斗胆希望打破今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怪圈而已。我们从历史获得的最好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所激起的热情：歌德老人的这句名言使作者们希望并相信，通过这套书系所包含的真实和诚恳，能与同时代的公正读者交交心，并由此获得为自己的事业激发热情的一种鼓舞力量。

1996年5月

目 录

总序·····	贾植芳	1
题解·····		1
我还年轻·····		6
大碗茶之歌 ·····		12
“将心比心”记·····		17
几件可以串连起来的往事 ·····		25
迷信种种（上） ·····		33
迷信种种（下） ·····		42
最佳的“佳作” ·····		50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续考·····		55
一字之差 ·····		59
一条新闻与一种流风 ·····		62
雪峰同志的几点风范 ·····		67
炽热，纯青，肃穆，高洁 ·····		72
悼念为艺术真理而献身的胡风同志 ·····		79
雨过天青云破处 ·····		82

温故而知新	87
胡风和我	96
读《墙内集》忆胡风	171
周扬同志病中约见我	178
靳以先生二三事	185
忆梁宗岱先生	190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94
冯至先生的一封信	197
卞之琳先生和“一首好诗”	202
阿垅遗著《南京血祭》序	206
《路翎》序	210
路翎走了	219
《路翎文集》序	221
伴灵絮语	226
悲痛与惋惜	231
冀汭诗集《灌木年轮》校读小记	235
《诗神·炼狱·白色花》序	239
《鲁藜研究文粹》序	243
《从影断忆》引起的题外话	247
何满子著《中古文风采》序	252
爱就是痛苦	257
我们的金婚纪念	268
[附录] 那一缕难得的阳光	314
编后闲话	318

题 解

“未烧书”，字面就是没有烧掉的书，用不着解释。

拿它来做书名，又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会引出种种猜测。

最直接的一种大概是：莫非作者借用秦火焚书的典故，意在讥弹时政，暗示这是一本漏网的禁书么？

这样猜，你就猜错了。事实上，用这三个字做书名，和那个典故风牛马不相及，倒是打算按照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基本规律，映衬一下自己沐领时下文化熏风而局促不安的心情。如果动机与效果得以统一，就不妨直说，这还是得意于郭沫若先生。

1967年，在中国大陆，文化成为瘟疫，知识等于毒品，知识分子即文化人诚惶诚恐如罪犯，枉然企盼命运之神的宽贷。这时，他们的最高代表郭沫若先生在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言：“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谈，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这段话发表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已记不清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估计说了没有多久，它便已在知识分子中间不胫而走，并叫人不寒而栗，眼见一场大火就要顺理成章地烧起来了。

且说当时我已远离文化，也没有写出多少字，即使果真烧起

了那场大火，自以为也未必烧到自己头上来。照说，郭老的这番话不会在我心里留下什么痕迹，当时要记住的大小事情多着呢；可我偏偏一直没有把它忘记，善于联想而兼收并蓄的人脑真是奇怪得很。郭老当时那样说，尽管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客观上却为知识分子在四个小人的淫威之下自暴自弃、自轻自贱起了带头羊的作用。后来，虽然他的书一个字也没有烧掉，广大知识分子所写所藏的书却经过抄家大批大批地散失了，那场没有烧起来的大火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它的任务。郭老的那段名言开始成为发人深省的历史掌故，时刻告诫人们：今后如能躲脱这场浩劫，千万不能再干为可能复燃的大火添柴加薪的蠢事了。

然而，那个历史掌故终于变成了轻松的笑谈，它当年所引发的疑虑，不过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短视而已。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实践”观点得以恢复，接着开始了使全民族起死回生的改革开放。在这个新时期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如蛰伏的冬眠动物纷纷惊醒过来，意外地发现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春天。出版界空前活跃起来，出了不少公认的好书，使广大读者对它们寄托了希望，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决非如某大员所斥责的“又懒又贱”。所谓“好书”当然只是比较而言，比沙漠化的前十年、前十几年要好一些而已，中流砥柱的作用还难以产生。何况知识分子毕竟是人，是人都有弱点，其中之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至少把郭老那番话的弦外之音忘得干干净净。近十年来，主要在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部门，先是观点的渐变，逐渐发展到立场的突变，于是在那些好书的旁边，先是个别地、悄悄地，后来则是成批成批地、日益俨乎其然地，摆出了各种各样在很多人看来不能称之为“好书”的书，真正“没有一点价值”的书，以至“应该全部把它烧掉”的书，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逼得那些好书不得不靠边儿直至消失了。然而，这个现象

之所以出现，原因十分复杂，非三言两语说得清。其方兴未艾之势，更非既有舆论方式遏制得住。须知这样看的虽是“很多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因为并不这样看的同样还有很多人，甚至更多人。于是，隐约间，分出了两派文化观察家：一派就是这样看的摇头派，他们认为慢说同“文革”时期相比，即使同“文革”以前十几年相比，文化简直彻底走向了反面：不但有肆无忌惮的尝试者，更有轻车熟路的引导者，摇旗呐喊的吹捧者以及负责同国外挂钩或接轨的传播者，人多势众，震耳眩目，个别批评无济于事，徒遭对方嘲笑，于是愤愤不平，只好摇头叹气。另一派则是不这样看的拍手派，他们笑眯眯站在书店门口，一面为刚出版的大部头“精品”、“文集”签名助销，一面欣赏改革开放为他们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带来的繁荣景象，认为即使局部个别或许偶尔出现什么不妥，都会自行改正的，不足为怪，更无庸多虑；至于前者的骂骂咧咧，即前文所谓“徒遭对方嘲笑”的个别批评，不过是些写不出东西来的旧文人的牢骚或“戾气”，同样不足为怪，更无庸多虑，云。

说是两派，其实也并不确切，因为任何时候都有“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一般没有发言权，或者没有运用自己的发言权，只是以简单的取舍来默默影响事物变化的进程而已。说到前一派的愤愤不平或后者的沾沾自喜，他们并非没有了解，只是限于“沉默”的本分，无从作出相对的感应。对那些文化现象本身，他们更保留着自己的看法，倒不是顾虑会为右方讥为“左”或为左方诟为“右”，只觉得既做不到“闻者足戒”，也就只好不说也罢。近十多年来，文学界出现一批坚实的耕耘者，他们有目共睹的成绩虽仍未能产生中流砥柱的作用，毕竟代表了一股令人鼓舞的朝气与活力，预示了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的萌蘖。与此并存而甚嚣尘上的，则是另一种异化于严肃文艺传统的实践与论点，如以所

谓“玩文学”来消解文学，以所谓“零度感情”来抵制激情，以所谓“躲避崇高”来迁就卑下情操，以所谓“满足欲望”来追求诱惑感觉等等。其所以然认真追究一下，与其说是改革开放，信息骤增，高科技介入日常生活，“后工业社会”的某种失落感传入境内所致，不如说是固有的历史沉渣在新的风波之下的泛起，其原型在鲁迅笔下久已纤毫毕见。至于那些公然认贼作父的翻案专家，那些和人物一起拉着读者做色情游戏的小说家，那些自吹自擂、相互吹捧、拿肉麻当有趣的哥儿姐儿们，以及利用目前写作环境改善而舆论监督失灵的大好时机“过把瘾”之余大捞一把的文学商贩，他们开辟货源的本领，招揽顾客的手段，难道还要靠外国人来教么？然而，归根结底，时间并非一条可以永远顺水推舟的河流，文学史也不是可容投机取巧、虚张声势者敞进敞出的公共场所，任何美妙一时的繁荣影响没有赖以支撑的精神实体作柱石，都是不会持久的。

现在又是一个世纪末。上一个世纪末，在欧洲据说以“颓废”为标志；这个世纪末，中国正面临历史的转折与飞跃，其标志不会是“颓废”，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个成语庶几近之。笔者自省：头脑虽未完全僵化，却已有点象“稀粥”一样坚硬，步履虽还不至于颤颤巍巍，却已迟缓得近乎一支催眠曲，离先锋、前卫或启蒙者们的自命品级差得很远，对文化现状没有资格充当摇头派或拍手派，基本上厕身于“沉默的大多数”。但，也难以绝对地“沉默”，偶尔也应约写点自己熟悉的东西，大都是些于大局无关、即使沾点边也毫无效应可言的废话。到了积成一本集子的时候，凑巧有个出版社愿意出它一下，出于凑热闹的心情也就答应了。为了做预告好打开销路，编者来信问书名是什么；笔者由于缺乏时下起书名所必需的眼光和经验，但漫应之曰：《题未定》。但也不能永远“题未定”下去，到了要交稿的前

夕，便求助于记忆——附带说一下，这本集子基本上来源于记忆，与诗人们所自评的先验、预测、前知等等毫无干连——不禁想起几近忘却的郭老那段话，才决定用“未烧书”这三个字，其本意明明白白就是说，这是①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也“没有一点价值”，因此，“应该把它烧掉”的——②但同样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也未必多余到哪里，因此又不甘心“把它烧掉”的——③所以终于没有主动付之一炬，且让时间去烧的一本书。归根结底，时间正是一团看不见、摸不着的烈火，万物通过它而实现自己的有限的存在，其最终着落要么就是凤凰，要么就是一堆灰烬。在由烈火主宰的变化过程中，凤凰毕竟是稀世之鸟，绝大多数经变化而不灭的物质都不过是灰烬，又岂止这一本“未烧书”？但是，有诗为证：“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坚信新世纪对于中国人民必将是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天地：不仅全民以赴的改革开放会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本世纪一些怎么也搞不清楚的人和事，以及各种一哄而起的“显学”、“杰作”等等都将经受明确、公正而又彻底的重新评价，让人不得不惊叹历史辩证法的巨细毕究的批判力量。

1996年7月24日

我还年轻

——只有七十岁。何况七折八扣下来，说不定显得更年轻。
——什么，你还年轻？还想扳着指头数年岁，不怕人笑话，你活到没有别的什么可数么？——岂敢，人生慢慢悠悠，可数的东西多着呢：拍不开的门，见不着的人，收不到的通知，等不及的许诺，唤不回的灵感，悔不迭的蠢事……五花八门的遗憾数不胜数，何致于下作到去数暴光废片似的岁月？不过，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倒与一则涉及年龄问题的往事有关。

1950年间，全国解放不久，人人充满新生的喜悦，仿佛都只有一周岁。随军南下的诗人李又然进了武汉，特地到中山公园一间荒僻的临时宿舍来找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不过是想聊聊天吧，当时聊天就是做宣传工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已知他是著名散文集《国际家书》的作者，还听说他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我只二十几岁，在他的渊博和老练面前显得相当幼稚，几句无谓的寒暄之后，便专心倾听他畅谈国内外的革命掌故。对白一转成独白，刹那间我不禁走神，贸然插问了一句：“您好大年纪？”岂料他像一柄断弦琴似的戛然而止，随即拉长了面孔，用近乎训斥的口吻中断了他的长篇大论：“革命者是没有年龄的！”

一晃二十年，到70年代初，我们还在干校见过几次面；后

来，这位没有年龄的革命者仿佛消失了，也不知是哪年故世的。他当年对我的那番开导，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但那个警句却像钉子一样扎实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此后每忆及自己那唐突的一问，便感到不胜懊悔而又侥幸。首先，懊悔自己出言不逊，有损诗人作为革命者的尊严，从而丧失继续从他聆教的幸运。我为什么要发神经似地来那么一句呢？说来可笑，大概小时候听惯了大人们这样感叹：“你几时才长得大啊？！”言下之意，长大了就好了，年龄似乎正是一个人成熟、能干、有出息、有身份的保证和标志。见到诗人谈吐不凡，令人神往，不觉琢磨起来：几时才长得跟他一样大，一样有学问呢？这段可笑的思想活动经那一问而显现出来，怪不得他不屑于同我再谈下去。但是，懊悔之余，毕竟又侥幸听到那么一句真理，从而增加了走向革命的勇气：我当然也要革命，也要锻炼到和革命者一样没有年龄。

然而，没有年龄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就没有存在。所谓革命者没有年龄，无非是说为了革命而永不离休，最好把自己的年龄忘掉。可年龄又怎么忘得掉呢？至少填起表来，“年龄”一格同“姓名”、“性别”、“籍贯”等等摆在一起，都是非填不可的。例如在医院里，为了确诊，诊断书或药方上的“年龄”又怎能空着？这也只是想当然耳，实际上医生们大都把它简化成一个“成（人）”字，而在一般机关单位里，许多表格则把令人难堪的“年龄”二字换成了比较隐晦的“出生年月”——这样一来，人与人的关系似乎简单而和谐，用个新词来说，也就“低荡”（détente，法语：缓和）多了。看来，通过约定俗成，社会已逐渐懂得，年龄并不是一个人的精神结构的可靠函数，反而常常在有关测定上造成误差。那么，从个人来说，一心记挂着自己的年龄，仿佛从中有什么稻草可捞，不是越来越不合潮流么？

正是为了避免年龄的干扰，我向来不热中过年过节（陪孩子

们凑趣儿，是另一回事），更不张罗替自己过生日（六十岁例外，托拨乱反正之福，一家人才拍了一张合照），同时也不大关心朋友们的生日（“祝我们大家永远年轻！”）——唯愿自己糊里糊涂活下去，跨过各种各样的代沟，既可陪青年人梦想未来，又可陪老年人回忆过去，无往而不得宜，岂不优哉游哉！不过，提起过生日，倒想到了俞平伯老人的一件轶闻。听说他曾大吵大闹，抗拒家人为他筹办九十大庆，以致引起惊诧和尴尬，被认为是老年的乖戾。他的心情照说不难理解：原来人生有限，过一天少一天，过生日的实质不就是被拉拉队吆喝着，尽快拥向那个极限去么？然则我致力于忘掉年龄，从事这项精神减肥的锻炼，其心理背景竟与俞老的大吵大闹未免相通不成？不见得，也不见得。

今年元旦，孩子们照例带回了几份新挂历。挂上新挂历，就得摘下旧挂历——那只是一份旧挂历吗？随它一起被销掉的又是一个365天。欣赏花花绿绿的挂历封面，才讶然发现自己已经活到第七十个年头了。把十年比作一天，也不过只活了一个星期；可今天正是“安息日”，据说到这一天，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行创造性劳动。尽管仍然认为自己还年轻，只有七十岁，但毕竟七十岁了——生理上不觉得老，那也是瞎说。却也不必张皇失措，要紧的是个态度问题，是如何应付老之已至的心理架式问题。把“童言无忌”改个字，倚老卖老，固然腻人；把头发染黑，猛擦增白粉蜜，以老充少，更未免无聊。李又然之所谓“没有年龄”，我之所谓“忘掉年龄”，绕点弯子来说，不在其外表现，而在其内表现，也就是说，要设法在内心保留一点青春感。须知青春感是一种超年龄的心态，并非青年人所独有，说不定惟有老年人才能有，其标志仅在于维持自己还能继续学习下去的一点信心而已。鲁迅晚年说过，“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正是这个意思。否则再不愿意学习，或者认为自己再不需要学习，

即使再“没有年龄”，怕也“老”得够可以的，这当然不是怂恿你当真把年岁抛在一边，硬着头皮去同青年人扳腕子——你不会踢球，又何妨培养兴趣，积累知识，认真看懂几场球赛？你不会冬泳，难道不可以设身处地，了解一下健儿们那样不怕冷的心理素质？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包括你我在内，都不难心中有数：所谓“继续学习下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积极行为。

说到“亡羊补牢”，让我想起另一件往事，其警惕作用似不亚于李又然的训斥。远在读中学的岁月，不知从一本什么闲书上，读到一则千把字的外国随笔，简直同经历了一场梦魇似地读完了它，惊得一身冷汗。大意是：新年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窗前，仰望广漠的蓝空，只见一颗流星滑过，坠落在黑暗之中；接着他低下头来，恍惚看见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阳光普照，鲜花盛开，另一条阴暗潮湿，蛇蝎遍地——不知怎么搞的，他发现自己正走在第二条路上，于是绝望地叫喊起来：“回来吧，我的青春！让我重新选择我的路！”又不料这一喊，竟把他自己喊醒了，原来不过是一场梦，他并不是一个老人，尽管犯过错误，走了弯路，但还年轻，还能重新走路。于是他伸出双手，高呼：“哈利路雅！”拼命向第一条路奔去……这篇的深意一望可知，正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中国古谚的形象演绎。为了增强警惕效果，作者不惜采用意在令人恐怖的对比手法；为了提高鼓舞力量，又故意把它只写成一个梦，以便给主人公留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真可谓煞费苦心。想我当年，少不更事，颇为那种恐怖对比所震慑，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绝望的“老人”，同时也确曾如梦方醒而为自己庆幸，深悟一生要兢兢业业，不可滥用自己的青春，免得走上了第二条路，虽然终于没有文中主人公那样幸运，那么便当地走向了阳光和鲜花。

今天，如果再读到那篇随笔，就未必再为那个对比所震慑了，因为经历过的实际人生要比那点人工描写复杂而又恐怖得多；同时，也不会有当年或有的那点庆幸感，因为比起文中那个消磨六十寒暑的老人，自己还大了十岁。相反，对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点小意见：诚然，像原来那样写，对青年人未尝没有教训意义，但那点意义正像黑格尔所说的语法和逻辑一样，对于青年人其虚实深浅迥然异乎对于老年人，老年人理解得显然要比青年人深刻而沉痛。那么，作者为什么只把它写成一个梦，让主人公重新变成一个青年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年人呢？为什么不面对现实，积极地为那位“老人”想点办法，让他有个心安理得的归宿？是不是认为老年人不但欢乐没有了，连希望也没有了，以致他的悲惨与悔恨不值一顾或者不敢一顾？果不其然，我就想冒昧地说一句，这篇文章的意思实际上是很浅薄的，套用一句行话，由于作者的现实主义不足，远没有触及人生的底蕴和奥秘。

人性多矛盾，早有人指出过。人人希望长寿，却没有人愿意变老。其实，变老是自然规律，而在精神上防老，耐老，抗老，始终保持那点可贵的青春感，这才是艺术。这门艺术并不追求阳春白雪式的旷达和通脱，更不是催眠曲或兴奋剂似的魏晋风度，反倒必得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世界毕竟是客观存在，它一直存在着，决不因为你年轻，便与你同时开始；它将一直存在下去，更不因为你年老，便会跟着你一起结束。不论年轻年老，你我都不过是几十年的同代人，都应当正确掌握这个主客观关系，自觉地忘掉没有意义的年龄，充分利用转瞬即逝的眼前时间，争取更清楚、更真实地认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世界。回顾自己一生，好学谈不上，困而学之也大都半途而废，浩如烟海的新旧知识更令我惊叹而却步——而今既然觉得自己还年轻，看来仍得

按照僵鼠饮河的方式继续学习下去，除了把亲爱的汉语学着写通顺些，把最后几首诗写得让自己稍微心安，如果来得及，还想把手头一点有关资料认真读懂，好粗略地反思一下二十世纪躬逢其盛的几件大怪事。

且慢，那篇随笔的作者又是谁呢？当时限于自我震慑和自我庆幸的交织心情，一直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后来从一本专集或传记中发现，原来是与歌德同时的颇有艺术个性的德国名作家让·波尔·里希特。这位作家除了十几部迄无中译本的名著外，还写过一则与前文大异其趣的小诗，意译是：“人生只有三分半钟，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一分半钟去爱，然后在这一分钟死去。”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瓦尔特对它爱不释手，把它抄在自己的纪念册上，后来被歌德看见了，他在它后面添了这样几句：“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天有一千多分。孩子，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自不待言，人类所需要的只能是歌德的进取精神，虽然他的几句老实话没有前几句那样罗曼蒂克。至于让·波尔，他对于年龄，对于老年，对于人生，前后看法似乎大相径庭，实质上并无二致：前文的张皇和后诗的轻佻都只是对老无可奈何的表现，这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恐怕正是人类的大弱点之一。古往今来，歌颂青春的诗篇多不胜数，而将老年拟之为成熟、圆满、金秋的收获、人生的冠冕等等歌颂老年的诗篇也不在少数。请听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著名组诗《拉比本·依兹拉》的头一节：“随我一起老去吧！最好的还在后头，那就是人生的归宿，开端恰是为此而有。……”可惜诗太难译，要不拿来同我国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名句比较一下，那将是非常有趣而又有益的。

1992年2月，壬申发笔。